

毛泽东论宣傳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出版

1958年9月

目 录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摘录).....	1
井冈山的斗争 (摘录).....	5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摘录).....	9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摘录).....	11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摘录).....	1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摘录).....	15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摘录).....	16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摘录).....	17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摘录).....	17
反对自由主义 (摘录).....	19
和英国记者貝特兰的谈话 (摘录).....	19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摘录).....	20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佈告.....	23
论持久战 (摘录).....	25
论新阶段 (摘录).....	29
五四运动.....	30
反对投降活动 (摘录).....	32
“共产党人”发刊词 (摘录).....	34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摘录).....	35
新民主主义论 (摘录).....	36
脱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52
“中国工人”发刊词.....	54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55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摘录).....	57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摘录).....	58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摘录).....	59

論政策（摘錄）	19
矛盾論（摘錄）	62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摘錄）	64
改造我們的學習	66
整頓黨的作風（摘錄）	73
反對黨八股	75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88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114
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摘錄）	118
組織起來（摘錄）	119
學習和時局（摘錄）	120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綫	122
論聯合政府（摘錄）	124
愚公移山（摘錄）	128
論人民民主專政（摘錄）	129
在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上的講話（摘錄）	130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	131
“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編者排	134
“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編者按	136
“嚴重的教訓”一文編者按	137
“張郭莊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編者按	138
“一個整社的好經驗”一文編者按	138
“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編者按	139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編者按	140
“必須和反革命的破壞活動作堅決的鬥爭”一文的編者按	141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42
關於詩的一封信	172
介紹一個合作社	173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录)

(一九二七年三月)

……我們要反对那些所謂“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紳打击貧农階級的錯誤行动。事实上，貧农領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現在多数都变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賭，清盜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据衡山的調查，貧农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农会整頓紀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傳，对他們本人进行訓練，把农会的紀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損害貧农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权和城隍 土地菩薩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統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統（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权）；（三）由閻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阴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統——总称之为鬼神系統（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

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極大的繩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蝕祠款。坏的族長、經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紳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听她們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貧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貧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嶺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农民協會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張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攤神）遊香。浚口伏波嶺庙內有許多菩薩，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薩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員長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們頗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薩都給学生和农民共同燒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薩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壯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壯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貧农中就比較地弱一点，因为經濟上貧农妇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劳动，所以她們取得对于家事的發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农村經濟益發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許多地方，妇女跟着組織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漲而动

搖。但是現在時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現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項，还要待农民的經濟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們对农民应该领导他們極力做政治斗争，期于澈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經濟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貧农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經濟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証。菩薩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時期农民会用他們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薩，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薩。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傳政策应当是：“引而不發，跃如也。”〔一九〕菩薩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風水望墳山貫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墳山都貫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墳山也一齐不貫气了么？土豪劣紳形容你們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嘍，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确不錯，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員，确实是委員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聖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紳么？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减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說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傳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象現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壯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們的面前，一直鑽进他們的脑子里去，又从他們的脑子里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見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瞪脚揚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銳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葉开鑫〔二〇〕，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乡下农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从那篇遺囑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約”这些名詞，頗生硬地应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个紳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紳士摆格不肯讓路，那农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义么？”長沙近郊菜園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負。現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罵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沒有話說。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标語、圖画和講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傳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傳，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

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号，使它們的内容漸漸充实，意义漸漸明瞭起来。

（“毛澤东选集”卷一第二三至二四，三三至三八頁）

〔一九〕这句话是从“孟子”上引来的，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不射出去，却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应当引导农民得到充分的政治觉悟，然后便等待农民自願地自动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正确的風俗习惯，而不自已發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二〇〕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战争的一个將軍。葉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軍閥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將軍。

井岡山的斗争（摘录）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对敌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医治伤兵。敌軍的士兵和营、連、排長被我們俘虜过来，即對他們进行宣傳工作，分为願留願去两种，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杀”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們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歎。紅軍士兵們对于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聰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來也仿效我們的办法，不杀俘虜，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時，我們的人还是有拖槍回來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傳，如写标語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滿了口号。惟缺繪圖的技术人材，請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來。

.....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的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时受到打

击，白色恐怖一来，馬上反水。引导反动軍隊大燒永新、宁岡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們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宁岡、新城、古城、贛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傳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

政权問題

县、区、乡各級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符实。許多地方无所謂工农兵代表会。乡、区兩級乃至县一級，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會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和投机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認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畢，大权攬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談起。名符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專断的恶習慣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黨員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欢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应用于群众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会組織法（依据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来，糾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錯誤。

現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沒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脫离群众的意見，对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發現。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

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衛隊長（暴动隊長）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經常駐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爭着要干。他們挂起紅帶子，装得很热心，用騙术鑽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貧农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农階級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們。这种現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党在群众中有極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許多事情为圖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擱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后党要执行領導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張办法，除宣傳外，执行的时候必須通过政府的組織。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办法，是要避免的。

.....

土客籍問題：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發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閩粵边起，沿湘、贛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領山地，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們的区域内，宁岡、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宁岡的問題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产党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进剿”宁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应引到被剝削的工农階級内部來，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來。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遺留下来的習慣，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动軍

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着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鬥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並出布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权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毛澤東選集”卷一第七二，七四，七六
至七八，七九至八〇，八二至八三頁）

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关于單純軍事观点

單純軍事观点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其表現如：

（一）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会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則更进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

（二）以為紅軍的任务也和白軍相彷彿，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紅軍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众、組織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务。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傳群众、組織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設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傳、組織、武装和建設革命政权等項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軍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軍隊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險，如象国民党軍隊所走的軍閥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傳工作上，忽視宣傳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組織上，忽視軍隊士兵会的組織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組織。結果，宣傳和組織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

众是紅軍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 有少数同志囿于四軍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沒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濃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 不顧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艰苦地做細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滿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一〕。

單純軍事观点的来源：

(一) 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認識紅軍和白軍是根本不同的。

(二) 僱傭軍隊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紅軍，带来了濃厚的僱傭軍隊的思想，使單純軍事观点有了下層基础。

(三) 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發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 党对于軍事工作沒有积极的注意和討論，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單純軍事观点的原因。

糾正的方法：

* 这是毛澤东同志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決議。中国人民軍隊的建設，是經過了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紅軍（抗日时期是八路軍、新四軍，現在是人民解放軍）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期創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在这个时期內，紅軍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錯誤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許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經驗。毛澤东同志写的这个決議，就是这些經驗的总结。这个決議使紅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將一切旧式軍隊的影响都肅清了。这个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紅軍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軍隊。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民軍隊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發展和創造，現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綫还是这个決議的路綫。

(一) 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 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份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 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 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 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仅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毛泽东选集”卷一第八九至九二页)

〔一〕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潮”，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來。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摘录）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現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員中，還有許多人不明瞭經濟建設工作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還有許多地方政府沒有着重討論經濟建

設的問題。各地政府的國民經濟部的組織還不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去湊數。合作社的發展還只在開始的階段，調劑糧食的工作也還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來。各地還沒有把經濟建設這個任務宣傳到廣大群眾中去（這是十分緊要的），還沒有在群眾中造成為着經濟建設而鬥爭的熱烈的空氣。這些情形，都是由於忽視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而來的。我們一定要經過同志們在這次會議上的討論和會後回去的傳達，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农群眾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

第一，從組織上動員群眾。首先是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的同志，要把發行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發展生產，發展貿易這些工作，經常地放在議事日程上面去討論，去督促，去檢查。其次，要推動群眾團體，主要的是工會和貧農團。要使工會動員它的會員群眾都加入經濟戰綫上來。貧農團是動員群眾發展合作社、購買公債的一個有力的基礎，區政府和鄉政府要用大力去領導它。其次，要經過以村子、屋子為單位的群眾大會去做經濟建設的宣傳，在宣傳中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講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眾的生活，增加鬥爭的力量，講得十分實際。號召群眾購買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鞏固金融，發展貿易，號召他們為着這些口號而鬥爭，把群眾的熱情提高起來。假如不這樣地從組織上去動員群眾和宣傳群眾，即是說，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不着力抓着經濟建設的工作去討論、檢查，不注意推動群眾團體，不注意開群眾大會做宣傳，那末，要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

* 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演說。

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象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毛泽东选集”卷一第一一六至一一七，一二〇至一二一頁）

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摘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义呢？我們說，長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队，長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經有过我們这样的長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間，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偵察轟炸，地下几十万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尽的艰难險阻，我們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長驅二万余里，縱橫十一个省。請問历史上曾有过我們这样的長征么？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无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产。長征又是宣傳队。它向十一个省內大約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

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着陝甘邊區的“圍剿”〔二三〕，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作的。這一次政治局會議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一次極關重要的中央會議。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央決議在這裡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著重地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時，毛澤東同志喚起黨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於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後來我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但那次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書記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問題做了決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黨中央才獲得可能去有系統地說明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對於這類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這篇報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